

中國最早的照片

公元 1899 年 10 月，一個 42 歲的法國人，此人名叫方蘇雅，帶著 7 部相機和大量玻璃乾片（1885 年才問世）、歷時 11 個月後終於抵達了當時的雲南府城昆明，開始了他對這個城市巨細無遺的注視。在此後的將近 5 年時間里，他閱盡了這裡的山川湖泊、城鎮鄉村、街道建築、寺廟道觀，也包括上至總督巡撫下至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發生在這裡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將目光所及的一切盡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當時可能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百年後將成為亞洲最早、最完整地記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概貌的紀實性圖片；在他於 1904 年面對“變得如此熟悉”的景象無限傷感地說“永別了，雲南府”時，可能也不會料到，這些照片有一天會被一個中國青年萬里迢迢地帶回故土。但他很快就會發現，在他進入中國生活長達 10 年之後，中國也將進入他整個的後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懷。



方蘇雅其人

奧古斯特·費朗索瓦 (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中文名字方蘇雅。1857 年 8 月生於法國洛林地區一個殷實的呢絨商人家庭。15 歲淪為孤兒。從軍參與政變失敗後，改學法律。1880 年被省長比胡收為義子進入法國內務部、外交部。1893 年任法國外交部長私人祕書。1895 年 12 月起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1899 年 12 月起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1900 年 3 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1903 年 9 月兼任法國駐雲南省代表。1904 年任滿回國，同埃蓮娜·馬爾芒女士結婚後隱居鄉間，並修建了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庭院。1935 年 7 月 4 月病逝。作為一個殖民外交家，方蘇雅是法國殖民外交政策的積極推行者，他所到之處與中國地方高級官吏交往很深，尤與廣西提督、抗法將領蘇元春交往甚密，結為兄弟，“方蘇雅”這一中國名字也因此而取。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 1903 年昆明教案中方蘇雅輕易得到了清軍的護衛，從家撤離。這從一個局部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徵。1900 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方蘇雅以自衛為名，攜四十餘馱軍械至昆明，被南關厘金局扣壓。方蘇雅親率數十人以武力威脅將槍彈搶回。昆明民眾義憤填膺，包圍領事府，搗毀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眾的反帝鬥爭因清布政使治課帶兵鎮壓而告失敗。方蘇雅和 32 名法國人在雲貴總督丁振鐸的保護下全數撤離北部灣。1903 年，昆明教案終以允許英法合辦公司開發礦產、向法方賠款白銀十二萬兩告終。1904 年滇越鐵路破土動工，1910 年建成的滇越鐵路全長 850 公里，其中在雲南 466 公里。在一份法國政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政策尤深，宜控制鐵路修建權，以獲大量的礦產資源。”方蘇雅正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雲南。滇越鐵路修建期間，大約有 6 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

百年前熙攘的一條路（1899 年）：

圖中的白塔（現已毀）位於雲南府城東 2 里處，是當時拓東路上的標志性建築之一。圖

右的建築是古真武祠，為舊“漢營”，相傳是諸葛孔明南征時屯軍之所，唐代建拓東城，因此祠內有諸葛亮石刻像。從照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主要街道的路況和兩旁的集市貿易情景，是極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風情圖。方蘇雅選擇塔洞內有人、路中有牛車的時機拍照，是為了留下尺寸上的參照。這也是他慣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門（1899年）：

城建於明代，城上之樓叫望京樓，京就是指帝都北京。從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樓（包括內城門）雖然朝北，城郭的門卻朝東，代表的是龜掉（擺）尾之形。此外，當時的北門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墳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輿家的設計不僅將城牆造得格外堅實以抵擋鬼氣，還在城樓上塑有道教神像驅凶避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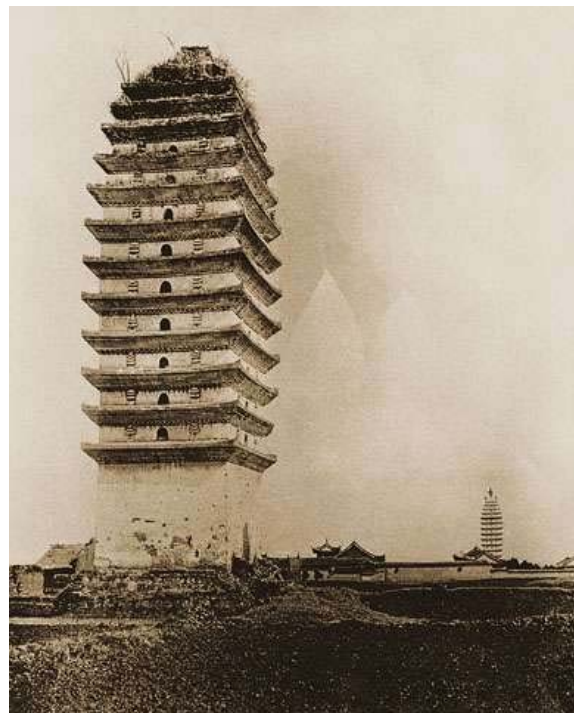
盤龍江畔的昆明城牆（1899年）：

遠處的金馬山影表明這是昆明小東門一帶的城牆，這裡地勢較低且緊依盤龍江：歷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條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據老昆明回憶，它漲水時“坐在城牆上就能洗腳”。於是治理它就成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要課目。受它的影響，古昆明城池的形狀建得並不方正，東邊略偏。



至今猶存的東西寺塔（昆明，1900年）：

“城南雙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初史謹在詩句中描寫的這種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見到，只是東寺塔（圖右）已不是史謹看見的那座南詔舊物，位置也更偏東，出了東寺街。



個性強烈的500羅漢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昆明1900年）

方蘇雅拍攝這張照片時，羅漢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飾簇新，色澤鮮亮，衣紋優美。對照今天我們看到的 500 羅漢，可以發現一些羅漢已經移位變形。比較明顯的是向九天攬月的羅漢，原來的手比身長數倍，後來不知為何變短了。



省垣第一名勝圓通寺，圓通勝境坊前的貧民（昆明 1898 年）：

照片上的“圓通勝境”四字相傳為明末黔國公沐天波所書，但並無具體史料佐證。方蘇雅攝影，很少單照景物，而這張照片中那對相互抱緊的父子與高大牌坊之間的對比，不但令畫面生動，也給整副照片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歷史與人文內涵。



令人詫異的護法巨龍：

照片中的兩根 10 米高的盤龍巨柱位於圓通寺大雄寶殿的正廳，這種代表皇帝的符號出現在寺廟中實屬罕見，對之的解釋也說法不一。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這一現象應該與由於“靖難之變”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炆有關。相傳建文帝到昆明後即在武定獅山正續寺出家為僧，法名應文，不久升任該寺住持。但為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蹤，應文大師甘作一名游僧，行跡不定。圓通寺歷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區最大古剎，應文曾在這裡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則以一外省寺廟而建如此巨大的兩條巨龍，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海源寺百年遺影（昆明，1900 年）：

青山古寺，靜謐安詳，這是百年前海源寺給人的印象。據說從前殿內還有玉蘭花一大株，根粗將近一人合抱，開花時滿樹皆白，香盈殿庭；寺前還有戲台，每年正月十五的廟會都有數千人前往遊樂。如今這一切都已盛況不在：照片中背後的青山已成為採石場，寺內一切均破敗不堪，且將房屋租借給民工貯藏炸藥。嗚呼！如此古寺，真的是在“火山”上面險情萬狀地苟延，隨時都有“性命”之憂。



劫波曆盡存金殿，全國最大的銅殿（昆明，1901年）：

照片中馳名海內外的昆明金殿因其堅固而熬過了戰火、地震乃至“文革”，留存至今。它比北京頤和園萬壽山的金殿保存完整，比湖北武當山金殿規模大，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純銅鑄殿。



總督、巡撫的排場：只能留下背影（昆明，1902年）：

這是在昆明東南郊菊花村舉行的迎接雲貴總督進城儀式。籠罩在圖片上方的這把洋布傘在當時的昆明已經意味著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時一般男子出門，天晴戴一頂細簷帽，天雨則戴一油簷帽，撐油紙傘的已是極為講究之人。當然，真正有排場還是圖中坐在馬上的雲貴總督和雲南巡撫，他們都是一品，從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蘇雅以法國駐雲南府領事身份獲得的官品是從二品，按規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時不得正面抬頭觀望，因而方蘇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給尊貴的雲貴總督留下一個背影。



赤腳儀仗隊（昆明，1902年）：

在離法國領事館很近的樺子坡街道上，巡撫的官隊正在通過。雖然於回避牌中穿行的儀仗隊給人以邏輯混亂之感（它將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在了在一起），但這卻都是清廷高官威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照片中尖銳斜插的彩旗杆與沉悶的背影也使畫面充滿衝突，不過右下角的那個男孩超脫於事件之外，他們通常都是臨時叫來充當儀仗的街童。只有他與相機鏡頭產生了對話；因為他與攝影者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



昆明眾生百態，背栗炭的青年（昆明，1899年）：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舊時很多地方都有專賣店。圖中這兄弟倆即以送碳、燒碳為業。他們是方蘇雅照片中最健壯的中國人之一，這可以從他們富有雕塑感的體型以及背上高壘的栗炭上看出。方蘇雅比較感興趣的可能是他們背筐下的支撐柱，今天的我們則更為照片所呈現出的純樸之美及力量感而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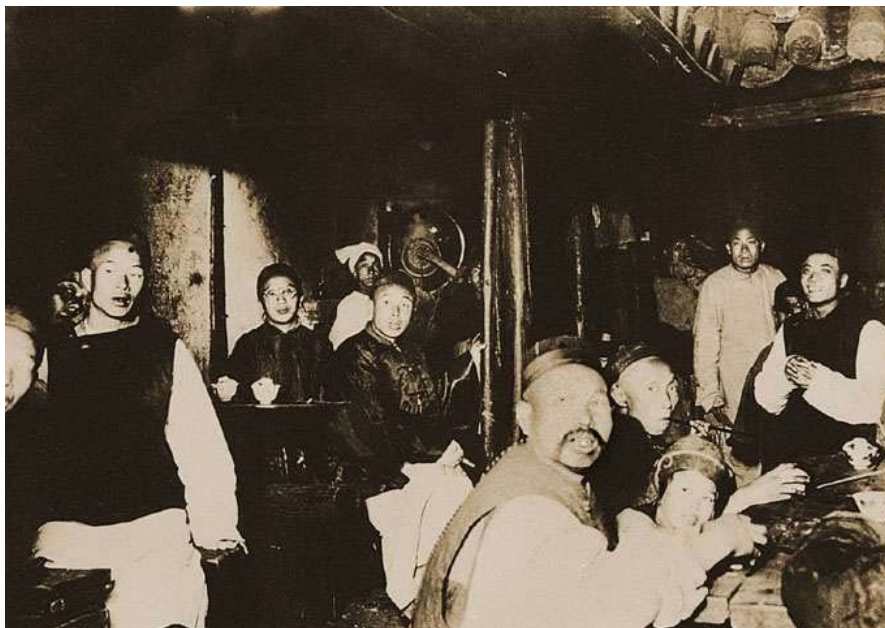
全副武裝的更夫（昆明，1899年）：

這個更夫在同行中堪稱衣著華麗、裝備齊全，而且工作範圍也小：僅限於法國駐昆明領事署內。他的工作用具除裝蠟燭的燈籠，中空的木魚以及木幫子以外，還有一把作為武器的小刀，理論上用於對付盜賊。方蘇雅戲稱他為夜間吵醒人的人，實際上則是代表法國人與中國生活方式接軌的一種象徵性嘗試。



茶客們（昆明，1899年）：

據《紀我所知集》記載，往昔昆明“茶鋪內之一切設備極其樸陋，大火爐上支一把大至無比之銅茶壺，內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壺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鐵練套住，扣在一比較粗實之尾柱上。旁為磚砌蓄水塘，塘近於牆，牆上則繪一烏龍吐水。飲茶者至，則沏一小壺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這張照片中，方蘇雅的興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數第三人是他在中國民間看到的第一個戴眼鏡的人。此外從畫面判斷，戴眼鏡的人背後頭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計，而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男子穿著完全相同的裝束，也許就是當年的時裝吧。



小吃攤前的人群（昆明，1900年）：

民以食為天，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許多習慣歷百年而不變：遮擋高原陽光的大傘至今街邊常見，傳統的豆花米線館、鍋魁甜漿館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傳統建築已大面積、無可挽回地消失了：當然也包括圖中人們那種對一個外國人的強烈好奇。



三人轎夫（紅河，1896年）：

從照片中看不出中間轎夫起什麼作用，也許他只是個替補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兩人的負擔。無論如何這是個辛苦的職業，而轎中的人往往也並不舒服：如果爬坡，兩腳就會懸空，身軀後仰不敢動彈；下坡時則要用力用膝蓋和手撐著轎子的隔牆，以免從門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婦女都要緊閉門窗，不能沿途觀賞。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折磨，而方蘇雅則認為這“像是為適應在洶涌波濤中航行的健身運動。”



粉墨登場的滇戲名角，倜儻小生（昆明，1901年）：

由於照片是攝於富商王熾的婚禮上，可以推斷主要演出者必為當時的名伶。從時間上推斷，圖中人物極有可能是當時馳聲雲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羅養儒形容“其唱工與做工，真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離別戲，能令一般婦女“淚下涔涔”，“真名角也”。



殘酷的刑法，被吊死的囚犯（紅河，1899年）：

站籠又稱立枷，這種特制的木籠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腳下可墊磚若干塊，受罪的輕重和苟延性命的長短，全在於抽去磚的多少。有的死刑犯會被如此示眾三天後論斬，有的則像圖中這名囚犯一樣被活活吊死。從木籠立柱上層層剝落的字跡上依稀能看見“徐老九”三字，也許就是這名慘死者的名字。據記載晚清一名叫劉松廷的滇戲演員也是死在站籠里。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誣偷了雲南藩台的銀子而將其裝進站籠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開腳下磚頭被吊死。現在看來，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廈將傾前的表象吧。



“站”以待斃（昆明，1900年）：

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邊站籠里的囚犯三天后就會論斬。為了不讓他低頭睡覺，一根鐵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嚨下面。他們所犯何罪，有沒有罪已不可考，面對照片的我們也唯有恐懼：沒有人願意再回到那個年代。



蘇提督的全副戎裝（昆明，1900年）：

完全可以想象方蘇雅是以什麼樣的眼光來看待廣西提督蘇元春的這身戎裝的，雖然蘇提督的確曾如此率軍抗擊過法國軍隊。如今這金盔鎧甲上的榮耀正與蘇提督一起在漸漸老去，甚至可能像掛在他身後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樣成為負擔。歷史無情，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身裝備就將永遠消失在戰場和軍隊里，成為博物館和戲團的收藏品：一個王朝曾經的輝煌與沒落都盡在其中。



貴婦華服（昆明，1899年）：

這位貴婦衣袖上兩道明顯的折痕表明，這套華服很可能是壓在箱底的陪嫁妝奩，是專為拍這張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時，這種裝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場合（昆明人叫“做

大容”)時偶爾穿穿。寬大是當時女裝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寬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見的鑲繡服飾和頭部的珠翠鈿子(勒子)外，這種裝扮在女子的後發髻上一般還有若干飾物：一對長約四寸、闊近半尺、重至三、四兩，銀底板上鍍金點翠的大寶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針、若干枝絨花，再連上簪子、綰針等，再加上一對金耳環附一對玉連環，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復的裝扮配在一雙小腳上，當時的貴婦自然是宜靜不宜動，囿於“婦道”之中的。



天足勞動婦女(昆明，1896年)：

這位表情憨樸、體態健康的勞動婦女不僅沒有纏過足，而且是赤腳站在亂石堆中，腳上有幾道明顯的草鞋勒痕。儘管如此，她的服裝仍具有寬大繁復的時代特徵(如裙外再套褂)，只是為了便於勞作而大大縮短了衣袖裙褲的長度。再請注意她的耳環及其下墜心形連環，排除質地，這在大的形式上與貴婦並無差別，可見這是當時的普遍風氣。只不過在貴婦那裡它只是繁多喧嘩的裝飾之一，而在一個勞動者身上則像一個美好願望或回憶那樣有著純樸自然的光亮。



傾城美婦人（昆明，1899年）：

圖中女子是時任雲南府厘金局（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海關）局長的太太，為當時昆明城內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擁有的一切也無不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美學：圓滿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蓮意味著“婦道”，加上寬大繁復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脫離勞動；在服飾上她鈿、環、戒齊全，金玉交輝，胸前掛著懷鏡（抑或是香包、懷表？），鐲子更是成雙成對地在手上堆積；左手執一帕大概是女紅作品，右手執一扇與背後詩聯則是風雅所需；磁器茶杯與水煙杆為當時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徵，旁邊一疊經書（《素女經》之類）也是每個淑女之必備。這一切與她身後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過這種關於限制與矯飾的精巧美學注定將因人非草木而從後代婦女身上消逝。



東方美男子（昆明，1900年）：

圖中男子系當時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臉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寬大，不論在中國人還是方蘇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國俊男標本，所以留下這張模特式的胸像。但從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這名男子雖然氣質儒雅，神態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氣與力度，與方蘇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員並無本質差別。



金榜題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題名的雲南名士當中，以右首袁嘉谷衣著最為樸素。據《紀我所知集》載，“袁實寒土也”。光緒十八年（公元 1892 年）昆明人士為培補昆明風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資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樓，作為經正書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貧寒僅“捐金五錢”，名列刻名的倒數第一位。十年後，他終於在金榜上將自己的排名糾正。



一個法國領事在中國—法國國慶日的盛宴（龍州，1898 年 7 月 14 日）：

照片攝於方蘇雅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柳州）領事期間的最後一個法國國慶宴會上。堂上掛的“德敷遠人”橫幅表現的本是一個東方大國的自信與氣度，而在 109 年前的這一天發生的法國大革命追求的則是“平等、自由、博愛”；但在英法聯合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炮艦政策流行的當時，這些語言顯得異常的蒼白，就像閃光燈照射下的每個人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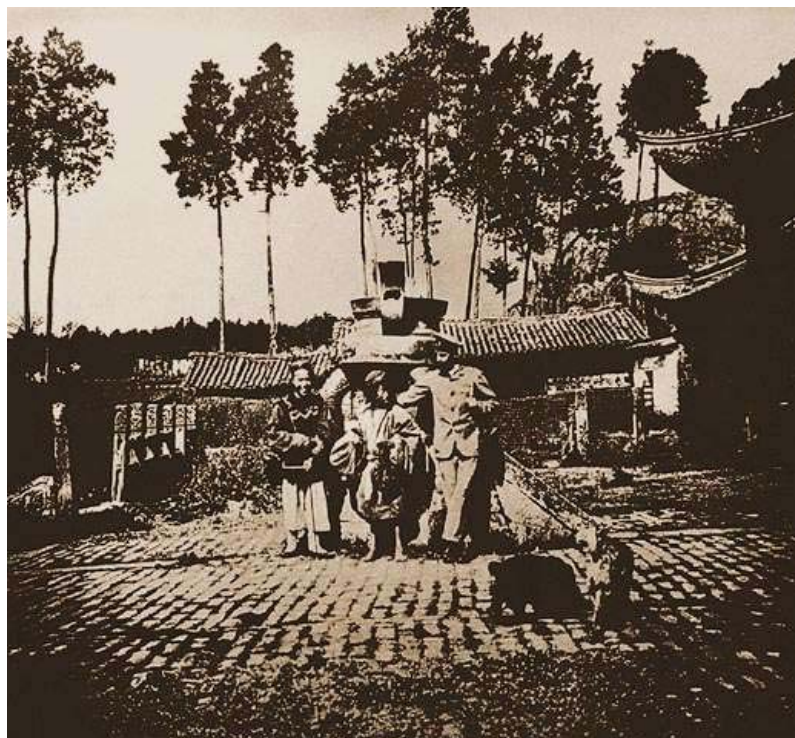
狐假虎威（昆明法國領事府，1900年）：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眾包圍中脫險。



領事、乞丐與差官（昆明，1900年）：

照片攝於昆明城垣內最大寺廟圓通寺，是方蘇雅與所有中國人合影中最親密的一張：他的手攬著一個行乞的叫化子，而左邊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難得的笑容。顯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蘇雅之手（那時還沒有自拍裝置），在構圖、取景的各方面都與方的照片差距明顯。



法國領事與抗法名將（廣西，1896 年）：

再沒有一張照片能這樣形象、準確，而且真實地反映當時中西文明的對比了。作為一個外交部的文官，方蘇雅的年輕、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將蘇元春露出了老邁，那身表明其官銜（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顯沉重。他們交往甚密，結為兄弟，但方蘇雅認為他們沒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個陌生人，盡管“方蘇雅”這個名字就是蘇元春所取：方是來自於“弗朗索瓦”，蘇來自於“蘇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風雅。



方蘇雅與埃蓮娜·馬爾芒女士：

他們在 1904 年方蘇雅任滿回國後結婚。埃蓮娜·馬爾芒比方蘇雅年輕 20 多歲，更多活了整整半個世紀，但始終對方蘇雅保持著懷念和幾乎是宗教式的崇敬。



掛在領事衙門口的頭顱：

1900 年義和團運動的參與者也許都具有樸素的動機和目的：敵視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復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個電報已經普及的時代，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消息傳到昆明後，民眾發現曾經默許甚至鼓勵他們的清政府已經迅速轉而把刀放在了他們的脖子上。這顆掛在法國領事衙門口的頭顱清楚地顯現了這一運動的悲劇性。



前來護駕的清軍：

居中的男子姓蘇，他奉命帶著一支 300 人的衛隊前往法領事署負責保護法國人。但當上萬民眾圍困著他們時，這些連鞋也沒有、背著煙筒和梭標的衛兵害怕得兩條腿在褲子里發抖。但正是這個蘇最後給方蘇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消息，使法國人得以在清晨撤離，避開了激憤的民眾。



古老令旗下的現代步操：

北校場比南校場大，建制與南校場相同，修建於清廷平定吳三桂（公元 1684 年）前後即因戰亂而片瓦無存，演武廳周圍都是亂墳堆，僅能供軍士操練而已。而在“令”字旗下操練德式步伐，雖然怪異，畢竟還是一種有機結合。



洪化堂炮隊在操練：

洪化堂（后稱講武堂）建立以後，聘請的是德國人任教官，創設綏靖新軍 3 個營，炮隊一個營。照片中的炮隊學員正在練習使用德國克虜伯炮，但近前三個學員似乎並不專心。此操場原為吳三桂官邸，現在省農展館一帶。



巨商王熾，迎彩禮的王熾一家（昆明，1900年）：

攝於王熾二兒子的婚禮（迎妝日）上，右數第二人即為王熾。景中箱盒里裝的都是女方的嫁妝，大致有一幅門帘、一對枕頭，鏡台臉盆、胭脂粉、簪環首飾、襖褂裙褲，及瓷碗瓷壺、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蘇雅寫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說他參加了一個大銀行家兒子的婚禮，並用法文諧音標出這家銀行叫“同慶豐”。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張有王熾本人出現的照片。



王熾的三小姐（昆明，1901年）：

作為大戶人家之女，圖中的千金小姐在這種年齡總是“養在深閨人未識”。但方蘇雅與王熾結為乾親，出入拍照了無所謂。照片呈現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裝束，與已婚婦人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頭髮和首飾，茶幾上的擺設則同樣程式化。從她胸前的念珠來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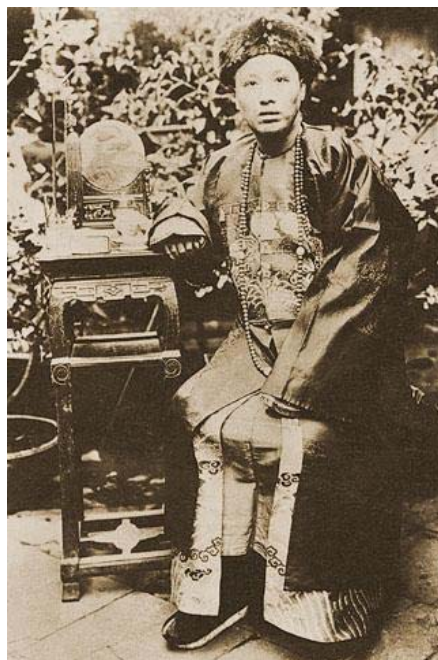
盛裝的新娘：

按羅養儒《紀我所知集》記載，新娘的妝扮為：頭戴鳳勒，身著紅綢喜衣，上頂紅綳蓋頭；髻上於金簪外再綰一如意形銅簪，於玉鐲外更套一對銅鐲；下圍綠布裙，於繡鞋上更套上一雙綠布軟底鞋，名為踩堂鞋；腳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圖中新娘的喜衣和頭飾顯然檔次甚高，精美的刺繡圖案花紋和銀玉串綴遮面，其富麗華貴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散發著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頂蓋頭地在家中讓方蘇雅進行拍攝，足見方與其家人關係非同一般。但他們可能想不到，憑著這張照片，這個新娘的華服和青春已永駐於歷史之中。



“九品”新郎官：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著官服，胸前的練雀圖案表明他是一個九品官。不過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錢捐來的，這也是當時大戶人家在娶親時的慣常做法之一。此時他手扶的木幾上擺放的水煙杆、翡翠煙壺、雕花銅鏡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與地位的值得炫耀的東西。



“奉旨修髮”匠（昆明，1900年）：

中國傳統認為，骨肉髮膚，受之於父母，因而不得故意傷害。由於嚴格實施確實有困難，有時只得變通。比如可以“修髮”，但不能“剪髮”，區別在於用刀不用剪，而且還要打著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髮”。從照片來看，這個“美髮師”的行頭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當中最因陋就簡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門旁一塊遮陽避雨的空地作營業場所，其標誌性的東西則是紅銅臉盆和掛在鐵鏈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兩根凳子也是當時修髮者必備：矮凳供人坐，高凳則用於顧客扶撲身體時所用。按說這種沒有鋪面的修髮匠還應在擔頭上插一面“奉旨修髮”的小紅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廢除。



方蘇雅用過的帶皮腔的相機：

類似相機方蘇雅帶了7部到中國，此外還從電影發明者、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手中借走電影攝像機一台，在中國拍下了長達30分鐘的無聲電影膠片。



方蘇雅使用過的玻璃底片盒：

這些玻璃底片尺寸各不相同，適用於不同的相機。1985 年它們連同其它一些物品被捐贈給法國國家博物館。

